

中国贸易条件冲击对同期私人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Terms-of-trade Shock on Contemporary Private Savings Rates

王陆垚^{1*}
Lu-Yao Wang

摘要

贸易条件改善意味出口品价格上升或进口品价格下降, 导致贸易盈余上升或贸易收支逆差下降; 在国民收入水平增长的前提下, 消费的增加小于收入的增长, 因此私人储蓄将会增加。本文分析 2000~2019 年中国收入贸易条件以及私人储蓄率的特征, 综述贸易条件与经常项目的相关文献并进一步建立经济模型, 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影响私人储蓄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每增长 1%, 私人储蓄率增长 0.45%, 但此结果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呈现相反影响。本文在此结论的基础上, 提出中国目前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时, 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性并优化贸易结构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贸易条件、私人储蓄率、“哈勃格-劳尔森-梅茨勒”理论

Abstract

Improved terms of trade mean higher export prices or lower import prices, which results in higher trade surpluses or lower trade balance deficits. Under the premise of an increase in national income, increases in consumption is less than that in income and the private savings will increase.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income terms of trade and private savings rate from 2000 to 2019,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erms of trade and current account, and further establishes economic model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private saving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every 1 per cent increase in China's income terms of trade, the private savings rates increased by 0.45 per cent, but the effects went opposite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ased on this conclusi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prov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optimizing trade structure when it conducts foreign trade activities.

Keywords: Terms of Trade, Private Saving Rates, H-L-M Theory

1. 引言和文献综述

在现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一国的进出口贸易能力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至为关键。国内外大量的文献研究贸易条件冲击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但其大部分将研究背景定位于发达国家, 缺少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

¹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国际商务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2901298584@qq.com*通讯作者

中，对初级商品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大部分进口国家对于初级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所以在遭受贸易条件冲击时，贸易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产生经常账户与实际收入的波动，从而对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在对外的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贸易诚然会带来可观的收入，一旦遇到贸易条件冲击产生商品价格急剧下降，就会加剧一国经常账户的压力；此时贸易市场价格变动的不对称性，使得这些国家难逃巨大损失。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缺少有效的国内信贷体系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且在宏观背景下有较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限制，因而在经济形势不利下更容易受到信贷限制；国际贸易市场上商品价格的上涨，会使经济主体减少比预期更多的储蓄。

贸易条件与经常项目之间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探讨的重点，但关于贸易条件如何影响贸易收支的结论各有说法。传统的“哈勃格-劳尔森-梅茨勒”(Harberger-Laursen-Metzler, 简称“H-L-M”)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会导致贸易盈余的上升或贸易收支逆差的下降；而贸易条件的恶化，会导致贸易盈余的下降或贸易收支逆差的上升。因为在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的假设下，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出口品的价格上升或进口品价格的下降，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且消费的增加小于收入的增长，因此私人储蓄会增加，导致贸易盈余上升或贸易收支逆差下降；相反，如果贸易条件恶化会使得出口品价格下降，进口品价格上升，国民收入水平下降，在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的情况下，消费的增加大于收入的增长，因此私人储蓄减少，从而导致贸易收支盈余下降或贸易收支逆差上升。

Obstfeld (1982) 以及 Svensson & Razin (1983) 认为 H-L-M 理论效应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贸易条件冲击的持久性。在他们研究两种产品（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的跨期均衡经济模型中，一个持久性的贸易条件恶化冲击，会使未来所有时期的收入下降，从而导致更低的消费支出和不变的储蓄，因此对经常账户不产生影响；相反，若贸易条件冲击只是暂时的，消费者将会通过减少储蓄来平滑消费，使得经常账户恶化，这种情况下 H-L-M 效应就会实现。Edwards (1989) 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暂时性的贸易条件恶化反而会改善经常账户。Edwards 在三种产品（进口产品、出口产品和非贸易品）的经济模型中，得到贸易条件恶化会产生两种替代效应，一者是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提高，意味着当期消费的机会成本上升，促使消费者推迟当期消费，从而导致储蓄率的提高以及经常账户的改善；二者是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转向国内产品，这使得实际汇率上升，进而提高当期消费的机会成本，因此导致经常账户的改善。由此可见，在理论研究上由于其严重依赖于模型的基本假设，所以贸易条件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陆前进与邵飞 (2014) 曾以 VAR 模型为基础对中国 1995 至 2012 年贸易条件和经常项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H-L-M 理论在中国是长期存在的；曹俊 (2014) 的研究认为贸易条件与经常账户差额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即中国 H-L-M 效应是不成立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并没有对中国的经常项目产生恶化的影响。

Meade (1988) 认为由于现实中贸易条件的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存在时滞，故汇率贬值或贸易条件恶化，可能导致贸易收支盈余在经历了短暂的下降后再重新上升，即产生了所谓的 J 曲线效应。Backus 等 (1994) 基于对 11 个发达国家经验数据的分析发现，贸易收支与以后及同期的贸易条件负相关，而与以前的贸易条件正相关，这种不对称跨期相关关系可描绘出一条横向的 S 曲线。王亮和吴滨源 (2014) 的研究结果表明，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存在 S 曲线效应，实证检验贸易条件恶化会导致贸易收支盈余在短暂的下降之后再上升，即发达国家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之间经验性的 S 曲线假设，在发展中国家也适用；而戴翔 (2011) 对中国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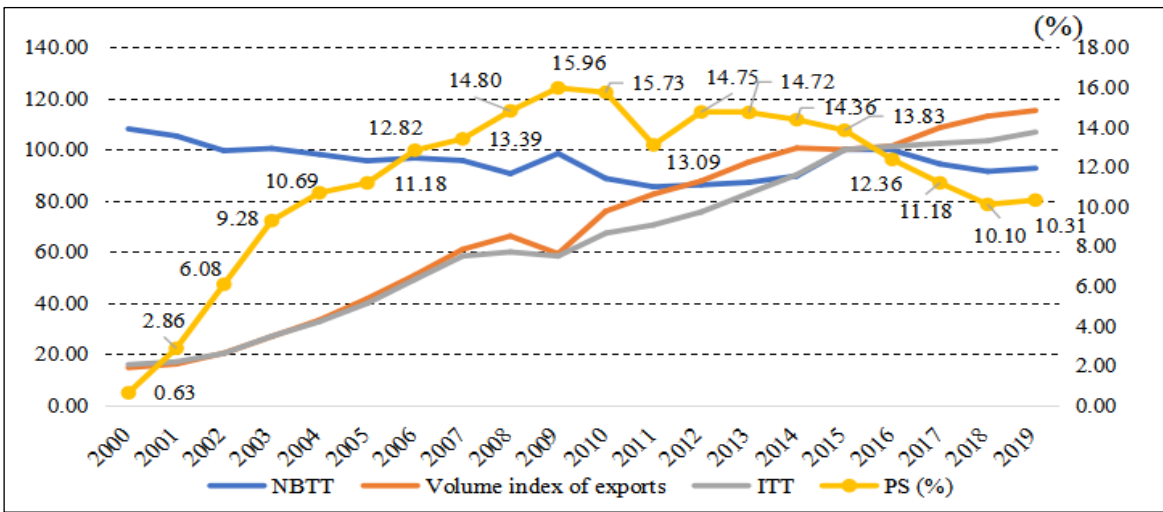
的动态关系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 S 曲线假设不适用于中国。

上述研究表明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分析探讨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之间的关系上，而缺少关于贸易条件冲击对于个人消费与储蓄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将从此角度入手进行相关研究分析。

2. 中国私人储蓄率和中国收入贸易条件

本文中，私人储蓄率 (PS) 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联合国数据库的相关的数据收集计算后得到，私人储蓄率即人均储蓄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人均消费支出，再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与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估算方法具有一致性。根据相关数据计算所得到的 2000 年至 2019 年中国的私人储蓄率见图 1。

图 1 显示中国 2000 年至 2019 年的私人储蓄率虽整体属于上升趋势，但中间仍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0 年至 2009 年的上升阶段，中国私人储蓄率从 2000 年的 0.63% 持续上涨到达 2009 年的 15.96%，此阶段增长速度迅猛，且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私人储蓄率起到正向影响，2009 年中国私人储蓄率由前一年的 14.8% 上涨至高点 15.96%；第二阶段为 2010 至 2011 年间的一个小幅度下降阶段，由 15.73% 下降至 13.09%；第三阶段是至 2012 年的小幅度回升阶段，从低点 13.09% 回升至 14.75%；最后的第四阶段是自 2013 年开始逐年缓缓下降的阶段，私人储蓄率由 2012 年的高点 14.75% 回落至 2019 年的 10.31%。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图 1. 中国私人储蓄率 (2000~2019)

贸易条件 (Terms of Trade) 是进口价格指数与出口价格指数之比，在双边贸易中，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其进口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对一国的对外贸易来说尤为重要。贸易条件由于贸易的所得角度不同，可以分为多种类别：价格贸易条件 (NBTT)、收入贸易条件 (ITT)、要素贸易条件 (FTT)。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收入贸易条件 (ITT)，为价格贸易条件 (NBTT) 乘以出口数量指数而得，价格贸易条件和出口数量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根据图 1 显示，收入贸易条件和出口数量指数呈现较为相似的上升变动趋势，而价格贸易条件大体呈现下降趋势，与收入贸易条件变化的趋势有很大区别。价格贸易条件在 2000 年至 2008 年间持续恶化，但是这期间的收入贸易条件却持续上涨，

其原因是出口数量在此期间也相继增加，说明收入贸易条件是用来衡量一国出口总能力的指标。图 1 显示中国 2000 年至 2019 年的收入贸易条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0 年至 2008 年，此阶段价格贸易条件下降，收入贸易条件持续上涨；第二阶段是 2008 年至 2009 年，价格贸易条件有所上升，收入贸易条件略微回落，但总体来看仍较为平稳；第三阶段 2010 年至 2015 年与第四阶段 2016 年至 2019 年收入贸易条件都持续上升，价格贸易条件在 2015 年前小幅度平缓上升，2015 年后逐渐回落。整体来看，2000 年至 2019 年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总体出口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3. 模型的建立

3.1 研究假设

本文研究贸易条件冲击对私人储蓄率的影响，此处以收入贸易条件进行探讨。收入贸易条件是出口价格指数比上进口价格指数的商与出口数量指数的乘积，即 $(P_x/P_m) \times Q_x$ ，贸易条件冲击是指出口数量指数的上升幅度小于净贸易条件下降的幅度，私人储蓄率为（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本文根据前文做出假设：私人储蓄率将因贸易条件的冲击而受到影响，引起下降。

3.2 数据以及模型说明

本文选取 2000~2019 年度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世界银行网站和联合国数据库，私人储蓄率和人均实际收入等变量是根据相关数据处理而得，被解释变量为私人储蓄率(PS_t)，解释变量为收入贸易条件指数(ITT_t)，私人储蓄率的滞后一期(PS_{t-1})，人均实际收入($RPCY_t$)，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GRPCY_t$)，货币化率(M_2/GDP_t)，通货膨胀率(INF_t)，抚养率(DEP_t)。本文通过以上的变量分析收入贸易条件如何影响私人储蓄率，并利用回归模型初步得到私人储蓄率函数：

$$PS_t = \beta_0 + \beta_1 ITT_t + \beta_2 PS_{t-1} + \beta_3 RPCY_t + \beta_4 GRPCY_t + \beta_5 \frac{M_2}{GDP_t} + \beta_6 INF_t + \beta_7 DEP_t + \varepsilon_t \quad (1)$$

3.3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宏观经济变量的不平稳而产生伪回归，本文使用 Eviews11.0 软件对上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 ADF 检验 (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 1，除私人储蓄率和通货膨胀率外，其他变量都是不平稳的。

表 1. 本文 7 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 统计量	P 值
PS	-3.9630	0.0076
ITT	-0.7901	0.7990
RPCY	5.2318	1.0000
GRPCY	-1.1493	0.6733
M_2/GDP	-1.2875	0.6130
INF	-3.5196	0.0197
DEP	-1.3528	0.5813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3.4 Johansen 协整检验

对上述的 7 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得到 PS、INF 是平稳的，ITT、RPCY、GRPCY、M₂/GDP、DEP 是不平稳的。本文运用 Johansen 最大特征值检验和迹检验，将变量分为两组，并分别检验各组之间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检验。第一组包含 PS、ITT、RPCY、GRPCY，协整结果见表 2；第二组包含 PS、M₂/GDP、INF、DEP，协整结果见表 3。综合考虑表中的 Johansen 最大特征值检验和迹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到这 7 个变量之间存在 1 个协整关系，从而我们得到该序列存在协整关系。

表 2. 协整向量个数 r 检验结果 (PS、ITT、RPCY、GRPCY)

原假设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 值	最大特征值 统计量	5%临界值	P 值
$r = 0$	79.8095	47.8561	0.0000	43.7135	27.5843	0.0002
$r \leq 1$	36.0959	29.7971	0.0082	18.0385	21.1316	0.1284
$r \leq 2$	18.0575	15.4947	0.0201	17.1312	14.2646	0.0171
$r \leq 3$	0.9263	3.8415	0.3358	0.9263	3.8415	0.3358

表 3. 协整向量个数 r 检验结果 (PS、M₂/GDP、INF、DEP)

原假设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 值	最大特征值 统计量	5%临界值	P 值
$r = 0$	96.0990	47.8561	0.0000	52.4329	27.5843	0.0000
$r \leq 1$	43.6661	29.7971	0.0007	22.9869	21.1316	0.0271
$r \leq 2$	20.6792	15.4947	0.0075	16.9828	14.2646	0.0181
$r \leq 3$	3.6963	3.8415	0.0545	3.6963	3.8415	0.0545

3.5 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上文的协整分析中可以得到私人储蓄率、收入贸易指数、人均实际收入、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货币化率、通胀率和抚养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可以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的验证。本文运用 Granger 因果检验对其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滞后 1-3 期的进一步检验，其结果见表 4。

从表 4 可以看出：在滞后 1-3 期的情况下，GRPCY 和 M₂/GDP 是 PS 的 Granger 原因；在滞后 1 期和滞后 3 期的情况下，ITT 和 RPCY 是 PS 的 Granger 原因；在滞后 2 期，ITT 和 RPCY 不是 PS 的 Granger 原因；在滞后 2-3 期的情况下，INF 是 PS 的 Granger 原因；在滞后 1 期，INF 不是 PS 的 Granger 原因；在滞后 1-3 期的情况下，DEP 不是 PS 的 Granger 原因。这说明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和货币化率会影响私人储蓄率，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人均实际收入和通货膨胀率对私人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

表 4.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Null Hypothesis	滞后期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IT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1	8.2237	0.0112	拒绝
RPC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7.6454	0.0138	拒绝
GRPC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5.8122	0.0283	拒绝
M ₂ /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12.4674	0.0028	拒绝
INF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1.5202	0.2354	不拒绝
DE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0.1268	0.7264	不拒绝
IT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2	2.8705	0.0928	不拒绝
RPC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2.6511	0.1082	不拒绝
GRPC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6.9585	0.0088	拒绝
M ₂ /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6.8065	0.0095	拒绝
INF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7.9210	0.0056	拒绝
DE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0.2863	0.7556	不拒绝
IT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3	4.8603	0.0245	拒绝
RPC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12.1660	0.0011	拒绝
GRPC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6.0452	0.0129	拒绝
M ₂ /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19.2039	0.0002	拒绝
INF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6.9214	0.0084	拒绝
DE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S		3.1445	0.0737	不拒绝

3.6 多元回归的初步分析

上节已经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 Granger 因果检验，证明这些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些变量必定会有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本节首先运用 Eviews 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即估计本文中的七个变量和私人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根据式(1)给出的估计模型如下所示，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5。

$$PS_t = -2.349 + 0.0499ITT_t + 0.5084PS_{t-1} - 0.0001RPCY_t + 0.4016GRPCY_t + 8.2706 \frac{M_2}{GDP_t} + 0.1216INF_t - 0.2343DEP_t + \varepsilon_t \quad (2)$$

表 5. 模型估计结果

待估系数	β_0	β_1	β_2	β_3	β_4	β_5	β_6	β_7
系数	-2.3490	0.0499	0.5084	-0.0001	0.4016	8.2706	0.1216	-0.2343
t-统计量	-0.1305	0.4320	1.4909	-0.7636	1.0128	1.1988	0.3480	-0.6593
P 值	0.8983	0.6734	0.1618	0.4598	0.3312	0.2538	0.7339	0.5221
$R^2=0.8777 \quad DW=1.4272$								

从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 0.8777$ ， $DW=1.4272$ ，说明选取的变量可以在 87.77% 的程度上解释私人储蓄率的变动，其余 12.23% 由未包含进方程的其他因素解释。

3.7 邹氏检验与虚拟变数设定

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的多元回归结果并不理想，其 t 统计量均不显著，结果并不足以解释收入贸易条件指数等变量与私人储蓄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节将数据以 2008 年为分割点分为两个部分：2000 年初至 2008 年底和 2009 年初至 2019 年底，先进行邹氏稳定性检验（Chow test）以进行进一步的估计，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由表中数据可得 P 值=0.0447，小于 0.05，说明以 2008 年节点，变量的相关性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本文将 2000 至 2019 年的数据以 2009 年为分割点分为两部分，加以虚拟变数“DUM”，2000 年初至 2008 年底设定 $DUM = 0$ ，2009 年初至 2019 年底设定 $DUM = 1$ ，运用最小二乘法中的高斯牛顿法和 Levenberg-Marquardt 迭代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结果模型的拟合优度 $R^2=0.9902$ ， $DW=2.4798$ 。

表 6. 邹氏稳定性检验

Breakpoint	F-statistic	Prob. F(8,4)	Log likelihood ratio
2009	6.4517	0.0447	52.6426

4. 实证结果

我们在 Eviews11.0 上运用逐步回归（Stepwise Regression）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begin{aligned}
 PS_t = & -52.9554 + 32.0806DUM + 0.4503ITT_t - 0.6192DUM \times ITT_t + 1.1016PS_{t-1} \\
 & -0.00056RPCY_t - 0.7696GRPCY_t - 1.8177DUM \times GRPCY_t - 8.8642 \frac{M_2}{GDP_t} \quad (3) \\
 & -0.6829INF_t + 1.6959DEP_t + 0.9615DUM \times DEP_t + \varepsilon_t
 \end{aligned}$$

表 7. 逐步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待估系数	P 值
C	-52.9554	0.0296
DUM	32.0806	0.2509
ITT	0.4503	0.0041
DUM×ITT	-0.6192	0.0020
PS _{t-1}	1.1016	0.0059
RPCY	-0.00056	0.0212
GRPCY	-0.7696	0.0185
DUM×GRPCY	-1.8177	0.0120
M ₂ /GDP	-8.8642	0.2106
INF	-0.6829	0.0200
DEP	1.6959	0.0106
DUM×DEP	0.9615	0.3190
$R^2=0.9880$ $\bar{R}^2=0.9690$ $DW=2.2747$		

从模型的检测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优度 $R^2=0.9880$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bar{R}^2=0.9690$ ，说明模型中所选取的变量可以在大约 97% 的程度解释与私人储蓄率的变动，其他 3% 由未在模型中出现的变量所解释。回归结果显示常数（C）、收入贸易

条件指数 (ITT)、人均实际收入 (RPCY)、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 (GRPCY)、通货膨胀率 (INF) 和抚养率 (DEP) 均通过显著性为 5% 的水平检验, 则据 2000 年至 2019 年的数据, 于本文所述模型出现的变量中, 真正影响私人储蓄率的因素有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人均实际收入、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抚养率。

上述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 本文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收入贸易条件 (ITT) 的系数在 2009 年之前为正, 在 2009 年之后为负。在 2009 年之前, 当收入贸易条件改善 1%, 私人储蓄率将提高 0.45%, 说明收入贸易条件改善后, 出口相较于进口的利润率增加, 这使得国民收入有所提升, 并且在缺乏有效的国内信贷和完善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 消费增长将少于收入, 从而导致私人储蓄率上升; 相反, 若收入贸易条件恶化, 国民收入将减少, 且减少幅度超过消费, 从而导致私人储蓄率减少。而在 2009 年之后, 由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收入贸易条件改善 1%, 私人储蓄率将降低 0.169%, 收入贸易条件对私人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 这表明若收入贸易条件恶化, 将刺激私人储蓄意愿, 从而导致中国私人储蓄率的明显提高。

滞后一期的私人储蓄率系数为正, 说明中国过去的储蓄量对目前的储蓄率的预期是一个重要的估计变量, 因为这能很好的表现出中国居民的储蓄习惯。人均实际收入的系数为负, 这与预期不符, 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 人均收入越高相应的储蓄率也将同步提升,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上升, 各式各样的理财投资产品层出不穷, 人们更多的选择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投资理财, 来赚取额外的收入, 而代替从前将钱存入银行的传统储蓄行为。

货币化率 (M_2/GDP) 在本文研究结果中的系数为负, 这表明当 M_2 增长占 GDP 的 1% 时, 私人储蓄率将下降 8.86%。货币化率代表着金融发展和改革, 此结果证实了金融的改革发展会刺激消费而减少储蓄; 但在这里此变量的统计意义不大, 因为在中国目前传统的 M_2 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被支付宝和微信中的电子货币替代, 人们在日常活动中使用电子支付的频率已经大大超过了使用纸质货币, 这将降低交易性货币需求的水平, 增加了预测货币需求总量的难度。通货膨胀率的系数为负数, 表示当通货膨胀率增加 1% 时, 私人储蓄率降低 0.68%。根据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率的增加会导致市场物品价格上升, 从而使花费更多的钱在消费上, 进而减少储蓄。抚养率在本研究中是呈现正面影响, 2009 年之前抚养率每增加 1%, 私人储蓄率就增加 1.70%, 2009 年之后系数仍为正, 但是并不显著。抚养率越高, 用来抚养老人和孩子所需要的花费就越高, 所以人们偏向于减少无谓消费, 而更多进行储蓄行为来应对未来不定危机。本文 2009 年后抚养率系数不显著, 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受到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这里不做赘述。

5. 总结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 对收入贸易条件对中国私人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论如下: 第一,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缺乏有效的国内信贷体系和完善的金融市场, 再加上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诸多限制的宏观背景, 中国的经济主体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 更容易受到信贷限制, 国际上市场产品价格的上涨会使他们的储蓄遭到冲击; 相反, 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 经济主体要考虑到商品价格上涨的风险而增加储蓄。第二, 本文在综述 H-L-M 理论, 即贸易条件与经常账户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收入贸易条件波动对私人储蓄率的影响。第三, 收入贸易条件在双边贸易中, 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其进口盈利能和贸易利益的指标, 相较于反应进出口价格变动的价格贸易条件来说, 衡量利益方面要更全

面。实证结果表明,在2009年之前,私人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与收入贸易条件变化方向相同。

本文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探究贸易条件冲击是否与私人储蓄率的变化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2009年之前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与私人储蓄率呈现正相关,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后收入贸易条件对私人储蓄率呈负面影响。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应对储蓄率变动时,应考虑贸易条件的冲击,提高人们的收入,改善人们的消费路径,从而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价格的上涨,进而增强中国抗击未来不定外来风险的能力;或者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的自主创新模式,实现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提高贸易条件来抵御储蓄率的变动。

参考文献

1. 陆前进、邵飞(2014)。贸易条件和经常项目变动跨时均衡分析—“哈伯格—劳尔森—梅茨勒效应”在中国的实证检验。南大商学评论,11(4),1-27。
2. 曹俊(2014)。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经常项目效应—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未出版之硕士论文)。福建省:厦门大学。
3. 王亮、吴滨源(2014)。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基于S曲线假说与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世界经济研究,11,42-48+88。
4. 戴翔(2011)。中国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动态关系—对S曲线的适用性检验。当代经济科学,33(2),106-111+128。
5. Backus, D. K., Kehoe, P. J., & Kydland, F. E. (1994). Dynamics of the trade balance and the terms of trade: The J-cur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1), 84-103.
6. Edwards, S. (1989). Temporary terms of trade disturbances,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Economica, 56, 343-357.
7. Lopes, A. F., & Sequeira, T. N. (2010). The dynamics of the trade balance and the terms of trad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cta Oeconomica, 64(1), 51-71.
8. Maurice, O. (1982). Aggregate spending and the terms of trade: Is there a Laursen-Metzler effec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7(2), 251-270.
9. Meade, E. E. (1988). Exchange rates, adjustment, and the J-curve.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74(10), 633-644.
10. Svensson, L. E. O., & Razin, A. (1983). The terms of trade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The Harberger-Laursen-Metzler effec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1(1), 97-125.

收稿日期:2021-02-12

责任编辑、校对:庄斯淇、曾晶莹